

上海文化熔炉中的现代身份养成： 基于犹太青少年难民自传的考察

高晓倩*

内容摘要 现今出版的上海犹太难民自传中，犹太青少年难民自传占据大半。这群来上海时还未成年的犹太青少年儿童如今已是遍布世界各地的上海犹太难民主体。他们在上海的“文化熔炉”中锻造出了新的身份。上海经历在不同向度上对其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今后的人生走向产生影响。本文重点考察犹太青少年难民自传展现的上海记忆，分析这段记忆中犹太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身份转型与身份困惑以及上海在新一代难民的现代身份塑形中扮演的关键性角色。

关键词 上海文化 犹太难民 青少年自传 成长记忆 身份转型

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设立租界，吸引了不少外来移民。1933年德国纳粹上台后陆续有欧洲犹太人来到上海避难，到1941年为止欧洲犹太难民总数接近2万。欧洲犹太人之前对上海知之甚少，选择上海作为避难地实为情势所迫。当时世界各国对犹太人采取严格限入政策，处于中日战争中的上海是世界上唯一无须签证即可进入的城市。犹太难民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从欧洲各国（德国、奥地利、波兰、捷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国）不约而同地投奔到上海。

来沪的欧洲犹太难民包括成年难民和青少年（包括儿童）难民。犹太青少年难民（以下简称青少年难民）因为在上海长大或出生，上海在不同

向度上对其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以后的人生走向产生深远影响。现今出版的上海犹太难民自传中，青少年难民自传占据了大半。一些青少年难民自传在身份建构的走向上呈现为向现代化和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另一些自传的身份发展轨迹稍有偏差，在身份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又夹杂着对传统的回归和眷恋，呈现了战后犹太人的主要身份困惑，即在现代化身份转型中如何协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本文聚焦青少年犹太难民自传呈现的上海记忆，重点分析青少年难民成长过程中面临的身份转型与身份困惑，以及上海在他们的现代身份塑形中扮演的角色。

* 高晓倩，女，1976年生。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记忆研究、犹太历史文化等。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战后犹太集体身份建构中‘上海’神话的功能：上海犹太难民自传及其文化记忆研究”（项目号：18YJA751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青少年难民的上海“成长记忆”与身份塑形

随着成年难民的相继离世，当初在上海流亡的犹太青少年是如今遍布世界各地的上海犹太难民主体。青少年难民自传以“成长”取代“流亡”作为自传的主题，以记述异国流亡中的成长经历为主，而艰苦的流亡生活则隐化为了成长的背景。传主把上海的流亡经历看作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成长阶段，是自我身份的一部分。

如果说成年难民自传把过去与现在相连，那么青少年难民自传注重的则是现在与将来。成年难民总是留恋故国和过去的身份，尝试在异乡流亡中恢复往昔的欧洲生活；而青少年难民憧憬未来，希望在异国新环境中塑造新身份、开创新生活。有别于成年难民自传所进行的身份重建，青少年难民自传的身份建构是基础接近于零的从无到有的建构。成年难民在欧洲已经具有稳定的职业和成熟的人生经历，他们的自传通常从各自的身份和经历出发，从不同的视角来回顾上海的流亡生活。而在青少年难民的自传中，流亡之前的经历并没有在他们的成长记忆中留下太多印记，如布鲁门撒尔所说：“我在柏林成长的岁月很快就隐退到脑后，变成了一段显然可以忘怀的已经完结的篇章，与将来毫无瓜葛。”^①青少年难民自传更多地从上海流亡经历对自我成长和未产生的人生影响入手，本质上是关

于自我成长的记忆。例如布鲁门撒尔自传强调上海经历对其政治人生的影响，联系背后的政治因素来反思犹太人当时的遭遇。赫普纳自传的侧重点在于上海时期的社会活动，通过从事多种职业和加入各种社团组织，他的社会生存能力大大提高。索卡尔自传呈现了自己在上海的求学和科研之路，这段经历为其成为出色的生物学家打下了基础。培根、格列宾希科夫、鲁宾、海德利和姆博格等几部女性自传揭示了犹太女青年在上海的成长、婚恋和家庭中遇到的问题，且伴随着女性特有的心理描写。

青少年犹太难民的“成长记忆”让人不由联想到德国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传统。^②

“Bildung”一词在词源学上经历了4个基本含义的演变，到最后有了“塑造成形、建构”之意。^③启蒙以后的观点普遍认为，“塑形”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人的规定性和地位都是可以改变的，人具有可塑性。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的“成长小说”正是这一观念下形成的产物：

成长小说一般以一个人的成长经历为线索，描述主人公从童年、少年、青年到成年的成长过程。主人公首先接受家庭和学校教育，然后离乡漫游，通过结识不同的人、观察体验不同的事，并通过在友谊、爱情、艺术和职业中的不同经历和感受，认识自我和世界。主人公的成长，是内在天性展露与外在环境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外在影响作用于主人公的内心

^①W. Michael Blumenthal, *From Exile to Washington: A Memoir of Leadership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The Overlook Press, 2013, p.56.

^②“Bildungsroman”有多种译法，诸如“成长小说”“教育小说”“修养小说”等。

^③“Bildung”源自拉丁语词“图像”（imago），后演变为“塑造成形、建构”（formatio, insitutio）之意。参见谷裕：《德语修养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页。

世界，促使他不断思考和反思。错误和迷茫是主人公成长道路上不可缺少的因素，是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①

由此可见成长小说的一些基本要素：（1）主人公必须离开家乡到异地历练；（2）主人公在不同方面经历不同的人 and 事后获得成长，即由外在引发内在的变化；（3）主人公成长的过程中会遭受挫折和迷茫，这些往往是诱发思考、促进心智成熟的动力；（4）主人公成长后认识自我和世界，完成了身份塑形并且确立了世界观和价值观。成长小说的这些要素在青少年难民自传的“成长记忆”中均有体现。“成长记忆”通常以记叙欧洲的童年经历为开端，讲述纳粹阴影笼罩下的家庭和学校生活以及与家人背井离乡、仓皇逃难的经过。其重头戏往往放在“离乡漫游”的经历上，主体部分的叙述全部集中于上海的人生经历和体验。相比在欧洲较为短暂而相似的童年记忆，上海部分的成长记忆更为丰富多样且印象深刻。青少年难民在上海拥有了真正的“异国体验”，从上海的世俗百态中增添了更多的人生阅历和智慧，加深了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当他们离开时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幼稚天真的孩童或少年，而是成长为独立坚强、具有担当的犹太新青年。

青少年难民自传将大量的笔墨倾注在上海的成长岁月中，在上海的这段时光是其人生中最重要身份塑形阶段。如果说成年难民自传只是把上海当作其身份建构的背景、参照或场所，青少年难民自传则是将上海真正纳入了所建构的身份当中。那么，在其自传展现的上海记忆中，青少年难民的成长究竟具有何种特殊性？不同性别、不同家庭和文

化背景的青少年难民在成长过程中遭遇了哪些身份问题？上海在青少年难民的成长记忆中扮演何种角色？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上海多元文化下的现代身份转型

犹太青少年难民的成长期处在20世纪巨变中，纳粹上台中断了他们在欧洲的成长之路，异乡居留阻断了与过去的家的地理联系，被纳粹迫害而流亡的经历带来心灵上的异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异乡流亡是20世纪现代社会所引发的特殊体验。屠犹、逃难、流亡和战争给予了这个时代的青少年以非同寻常的成长经历，死亡和生存是他们时常要面对的问题。

非同寻常的经历造成了青少年难民的普遍“早熟化”。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他们都在上海的社会大课堂里早早地接受了启蒙教育。格列宾希科夫来自柏林的犹太家庭，10岁跟随全家来上海避难。她的成长正是始于在上海遇到的一场死亡变故：好友露西在上海的酷暑中衰竭而死。在参加葬礼那一天，她瞬间成长起来：“那一天标志着我童年的终结，是该长大的时候了。我们不再妄想回柏林，从前的一切都逝去了。而生活，正在以我们意想不到的速度改变着。”^②死亡让她开始意识到生活的复杂和残酷，从对过去的幻想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上海巨大的生存压力使许多犹太青少年和父母一起挑起生活重担，体验生活疾苦。他们年纪轻轻就成了担负家庭重任的“小大人”。培根在自传中感叹：“我的童年突然结束了，直接毕业进入成年期——几乎是一夜之间。和我年龄相仿的朋

^①谷裕：《德语修养小说研究》，第39页。

^②伊·贝蒂·格列宾希科夫：《我曾经叫莎拉》，李康勤译，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年，第72页。

友们也是这样。那些孩子们该做的事，我们都没做。我们只是在一个世界——生存的世界——里生活。”^①除了心理上的加速成长，生理上的成熟同样来得过早，主要表现为“性早熟”，即对“性”过早的了解和体验。“性”是传统犹太教育比较敏感忌讳的话题，尤其是涉及女性的性问题。格列宾希科夫的母亲时常叮嘱她，“不管我们怎么喜欢男孩子，永远不要‘做’”，因为“不利于健康”。^②可是，上海的现实生活迫使他们较早地接触到了这类问题。格列宾希科夫终究还是从对面夫妇的房事中了解到了真相。搬进上海隔都（Ghetto）后，她还发现女邻居在家里与日本军官做起了性交易。“早熟化”现象无疑使青少年难民在突破传统束缚走向现代社会的成长道路上迈进了一步。

在上海多元文化的成长环境下，女性青少年难民在婚恋问题上同样表现出了明显的现代特征。上海的国际化使得犹太女孩们的交际面变广，在这里她们能够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国、不同身份背景的男性。以格列宾希科夫为例，十三四岁的她就在接吻游戏上把初吻献给了一位她暗恋的俄国男孩，她曾对上学路上留着大胡子的英俊印度交警痴迷不已，热情开放的美国大兵更是让她心动。格列宾希科夫的婚恋经历可谓一波三折。她和美国兵的狂热初恋没有持续多久便随着男方的撤离而告终，最终仍旧违背传统嫁给了异教徒——一位白俄小伙子。而她的姐姐嫁给美国兵后也于1948年移民美国。当时

许多犹太女孩的家庭婚姻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她们不愿做因循守旧的传统犹太妇女，而要成为新时代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

男性青少年难民的成长历程是一个逐渐脱离家庭、走向社会并获得独立的过程。摆脱家庭束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与父亲关系的弱化或断绝，且被弱化的父亲形象常常出现在男性青少年难民的成长记忆中。父亲是家庭的主导，其权力的弱化意味着家庭对孩子的约束力减弱。在传统犹太家庭中，父亲是文化传统的象征和传承者，他的弱化也意味着传统的衰微。赫普纳在自传开头就表达了自己对犹太传统的质疑以及与父亲关系的疏远。他出生于德国犹太家庭，父亲是传统犹太人，而母亲是同化犹太人。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因此他与母亲的关系远比父亲要亲密。与之相应的是他对父亲所坚持的犹太传统文化的背离，以及对母亲所代表的同化观念的趋同。对于成长于新时代、新环境中的年轻一代来说，是否还有必要跟从父辈来遵从传统的陈规陋习？按照他的说法，当时许多犹太青少年和他有着相同的疑虑：

我们该盲目地跟随父母或祖父母的脚步，听从某个不知名的拉比的教诲吗？如果说某些几百年前的传统只是出于美学或健康的原因应运而生，那它们在今天还适用吗？假如我们为了遵循这些老的传统习俗而违背我们的自然天性，我们会成为更好的犹太人吗？^③

^①Ursula Bacon, *The Shanghai Diary: A Young Girl's Journey from Hitler's Hate to War-Torn China*, Seattle: Hara Publishing, 2002, pp.229-230.

^②伊·贝蒂·格列宾希科夫：《我曾经叫莎拉》，第99页。

^③E. G. Heppner, *Shanghai Refugee: A Memoir of the World War II Jewish Ghetto*, Lincoln-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3, p.11.

从这些质疑中可以看出，传统在赫普纳的心中已然动摇。18岁那年，他和母亲一起逃离了德国，离开了还留在那里的父亲。

父亲影响的弱化使许多男性青少年难民远离了以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上海现代多元而又混乱无序的陌生世界里开启新的成长模式。他们寻求一种新的身份认同标准，即成为一个社会责任感强、阅历丰富、世故老道和适应现代社会生存的男子汉。与女性青少年难民自传在身份转型上更偏重内在的心理成长和家庭婚姻伦理观念的改变不同，男性青少年难民自传强调的是在外部世界中的历练成长、社会实践能力的提高和见识的增长。作为个人接触社会最主要的窗口，职场是男性建构身份的重要领域。赫普纳在上海期间接连不断地尝试了许多不同性质的工作，玩具店伙计、书店店员、面包店管事、货物审核员、机械修理师、重型车辆司机，等等。他在上海的职场中摸爬滚打，逐渐具备了丰富的社会经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男性青少年难民建构身份的另一领域是社会活动。上海的花花世界为其提供了最好的社会课堂。布鲁门撒尔认为他在上海接受的“优质教育”并不在学校，而是在上海街头。他13岁和家人从柏林逃到上海，上海丰富、复杂、多元化的社会环境对他的成长产生了积极影响，正如他所形容，上海的世界像个“万花筒”，里面应有尽有，让人大开眼界。^①在上海的市井街头，你会看到随处买卖的各类物资和商品，各种手艺和行当，街头的种种罪恶和不堪，来自各国的士兵、水手和警察混迹于当地

人中，最低俗的妓女、乞丐和仆人与最超脱的修女和僧人同时出现在大街上。华洋杂处、鱼龙混杂的上海街头充分展示了社会的多元化特征，在这个远离西方的东方大都市里暗藏着现代社会的基本雏形和原始生命力。布鲁门撒尔在上海社会的多元文化中看到了参与社会的必要性，与传统犹太人保守的立场有很大的差异。这使他明确了新的身份定位，立志成为一个在多元现代社会中担当重任的人物。正是基于在上海奠定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人生目标，布鲁门撒尔移居美国后成为卡特政府的财长并在退任后担任柏林犹太博物馆馆长，成为在上海成长的犹太青少年难民中的杰出人物。

以上青少年难民的成长记忆显示，青少年难民虽然在家庭和家乡的环境中获得了对自己和世界的最初认识，但在离乡流亡的旅途中才真正成长，通过各种人事体验和反思，重新认识自我和世界。他们在上海的现代社会中寻求新的身份认同，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身份转型。

三、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身份困惑

在欧洲遭受的严重迫害和远离欧洲大陆的异域环境不仅中断了犹太难民自启蒙以来与欧洲同化的进程，而且对其传统信念和价值观造成冲击。对于涉世不深、身份根基尚浅的青少年难民而言，遵循何种世界观和价值观变成了一个不确定的问题。究竟该选择什么样的身份取向？是回归传统，还是继续启蒙以后的现代进程？这种身份困惑常常出现在青少年难民的成长记忆中，尤其是出身传统犹太家

^①W. Michael Blumenthal, *From Exile to Washington: A Memoir of Leadership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The Overlook Press, 2013, p.68.

庭的青少年中。

托拜厄斯的自传最明显地突出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身份抉择的困惑。托拜厄斯来自波兰传统犹太家庭，从小受传统犹太文化熏陶。父母是传统犹太人，望子成龙，希望他能摆脱东欧犹太穷苦的命运，进入西方主流社会。如果没有变故，托拜厄斯的成长道路将会和大部分启蒙以后的欧洲犹太人一样走上与主流社会同化的道路，然而这一成长进程因纳粹迫害而被迫中断。6岁的他不得不放弃柏林的同化生活，随父母流亡上海。

流亡上海的这一阶段是青少年难民重新选择个人发展方向，延续在欧洲中断的成长历程的关键过渡阶段。从父母安排托拜厄斯进英式教育为主的上海嘉道理学校就能看出，他们仍然希望他延续以前在欧洲的成长方向，即融入西方现代社会。但是托拜厄斯在犹太会堂上希伯来文课时结识了耶什华犹太经学院的学生。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他渐渐显露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随后他转学到耶什华学院。在那里，他感受到一种和谐安定的氛围：“我们在那儿只说意第绪语，这使我感觉像在家里一样。”^①这里营造的传统文化氛围让他获得了长久以来失去的安全感和身份认同感。自此以后托拜厄斯在上海开启了回归传统的成长模式，只不过这一模式很快就被动摇。当欧洲亲人被屠杀的消息传来后，他出现了信仰危机，最终导致他和耶什华学院的分道扬镳。伴随信仰危机到来的，是好不容易建构起来的自我身份的垮塌：“最让我感到困惑的是我无法想象做一个脱离正统的犹太人，如果我不是犹太人，那我就什么也不是。”^②

从托拜厄斯的成长记忆中可以看出，他对传统的复归是特殊环境下自我成长的需要，信仰根基并不牢固。后来在美国获得新身份，他便决定彻底和耶什华学院告别，和那段虔诚的时光告别。最终，托拜厄斯的身份取向又从传统转回了现代。纵观他的整个成长过程，身份发展的模式一直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来回切换，体现了战后犹太人无法避免的身份困惑，即如何在现代多元的文化背景下协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短暂地回归传统虽不是上海犹太青少年难民的主流身份取向，却是其中一些人（如托拜厄斯、维特科夫斯基和鲁宾）来上海后作出的另类选择。鲁宾9岁随父母从布雷斯劳来上海。她出身更为保守的正统犹太家庭，成长记忆渗透着对犹太传统文化的眷恋。自传多次谈及犹太节日、生活习惯、葬礼风俗和祈祷仪式等等内容。众所周知，犹太人一年到头频繁的节日就是让其循环往复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和熏陶的最佳手段。鲁宾将自己的成长记忆和节日习俗结合起来，从犹太教历12月的普珥节开始，细数自己在一年中守过的每个重要节日，包括安息日、逾越节、沙夫幼特节、新年、赎罪日、住棚节、西姆哈斯《妥拉》节和光明节。她围绕每个节日回忆自己和家人在上海的守节活动，例如在安息日和父母一起散步去教堂参加活动、爸爸故意乘电梯的恶作剧（在安息日犹太人不允许触碰和使用电器）；在逾越节学会背出4个主要问题和制作“马扎”（希伯来语：Mazzah）；在住棚节里和妈妈一起用鞋盒玩搭建住棚的游戏等。守节经历是鲁宾用来诠释身份内涵的重要方式。

^{①②}Sigmund Tobias, *Strange Haven: A Jewish Childhood in Wartime Shanghai*,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p.46, 113.

然而，和托拜厄斯一样，鲁宾对传统的眷恋也不过是一种短暂应对流亡时身份危机的策略。传统始终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就像精神上的家园，可以在流亡的苦难中为她遮风避雨，提供安全感和慰藉。另一方面，传统在无形中又像建立了一座心灵上的“隔都”，成为她在陌生世界里的一道保护墙，将自我封闭、与世隔绝。一旦接触到外面的东方世界，她就不自觉地感到不安和威胁。因此在流亡生活结束后，她也和托拜厄斯一样没有再固守于传统的堡垒中，开始为了成为一个现代美国人而突破传统的束缚。与此同时，她也面临着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的身份困惑。在美国找到工作后，她坦言：“我每隔一个周六就得上班。这导致了一个困境。我仍然是一个守安息日的人，但是现在我不得不每隔一个星期打破一次戒律。”^①在后期的美国回忆中，她再也没有牵扯到犹太文化传统。由此可见，在这两部自传中，回归传统确实是犹太青少年应对身份危机时的一种有效策略，但是却无法逆转年轻一代最终奔向现代的身份走向。此现象说明，在犹太人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仍具备复苏的可能性，尤其在面对危机之时。这就意味着如何处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势将成为战后犹太人必须要应对的身份命题。

四、成长记忆中的上海：锻造新身份的“文化熔炉”

如果把每部青少年难民自传看作长篇小说，那

么上海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成长小说的主人公按时间顺序历经童年、少年、青年和成年等阶段，首先接受家庭和学校教育，获得对自我和世界的最初认识，其后便进入成长的关键阶段，即离乡游历。成长小说的重点正是放在离乡游历上。离乡游历标志着主人公正式入世，在大千世界中经历不同的人 and 事，在挫折和反思中不断丰富和修正对自我及世界的认识，从而获得成长。离乡游历包含了纵向维度和横向维度。纵向维度是个人成长的主线，横向维度是个人成长的外部条件和环境，一般是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全景，其中包括各种地理空间、社会现象和人物等。它为个人成长提供时间和空间上所历经的广度，同时为观察和反思提供素材，从而推进个人成长在纵向维度上的发展。在青少年难民的成长历程中上海经历恰恰代表了他们离乡游历的阶段。

上海作为唯一的东方流亡地独具异域色彩。陌生的东方社会在犹太人头脑中原本是新奇古怪、古老神秘的代名词，然而来上海后看到的画面却给他们以强烈的震撼。震撼来自两种极端对立的上海印象，这从两位青少年难民的自传回忆中可见一斑：

当“Conte Verde”号驶入黄浦江时，我们第一次见到了未来的家，我们惊呆了！我们眼前出现的完全像是一个迷你版的曼哈顿——摩天大楼比我们在欧洲看到的还要高……我们惊喜于能够见到这样的西方文明。^②

战争依然在远离上海的中国其他地区进行着。当黄包车夫慢慢地穿行于街道，我们看见

^①Evelyn Pike Rubin, *Ghetto Shanghai*, New York: Shengold Publishers, 1993, p.166.

^②H. P. Eisfelder, *Chinese Exile: My Years in Shanghai and Nanking*, Victoria/Australia: Makor Jewish Community Library, 2003, p.13.

一些房子已经完全被毁……手推车上堆着一些锅碗瓢盆，中国人正在设置在车子中心的炉子上烧饭……他们把碗盘凑到唇边，用两根细棍把食物送入嘴里。^①

一面是外滩沿岸高楼参天、展现西方文明的繁华大都市景象，一面却是经历战火后破败而嘈杂、混杂着东方特有生活气息的市井街头。出乎这些犹太青少年的意料，上海其实是一座具有典型西方特征的东方大都市，在当时享有“东方巴黎”的称号，东西方元素在这里碰撞、凝聚，形成和谐与冲突并存的局面。在上海，除了中国人，他们还遇到了来自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人，在华洋杂处的租界里，他们学会了公共交际语言——英语。青少年难民仿佛提前进入了一个多民族共存的现代世界，感受到了未来现代社会的生活模式。这与犹太人在启蒙运动后进入的欧洲社会不同，这里没有明显的主流和边缘之分，只有多边共存、此消彼长的态势。如此多元、多极的上海文化对青少年难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同时也充满着机遇和挑战，正如布鲁门撒尔自传中所回忆：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各个民族、各个种族、宗教、文化和任何可能的语言的家园，是形形色色、非同寻常之人物的聚居地。商人、传教士、难民、冒险家、间谍、代理人、奸

细、穷人或富人、圣人、罪人、势利眼、天才或傻瓜——在上海人们全都可以遇到，且如果你耳聪目明，总能从中学到点什么。^②

上海当时的社会状况异常纷乱和复杂，但又是极具发展空间、自由与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它提供了最广阔的社会舞台，使得青少年难民获得了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学习和反思的机会。布鲁门撒尔承认：“我毕生对公共事业的兴趣都起源于那段上海岁月。”^③施皮尔曼坦言：“上海经历影响了我以后的生活，也许还会影响到我一辈子的人生观。”^④在青少年难民眼中，上海不仅是游荡者和冒险家的乐园，更是寻找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试验场、是人格塑造和全面发展的熔炉。对于年幼的孩童，上海可以算作是第二故乡，他们在自传中都为自己贴上了“上海制造”的身份标签。海德利在自传封面和每个章节都打上了中文名字印章“安娜乐丽”，以此表明身份所带有的中国烙印。她同时表达了自己对上海的身份认同感：“它是我唯一真正了解的城市。即使我没有出生在那里，我也多半是上海制造的产品。我把自己看作是上海人。”^⑤出生在上海的姆博格在自传开篇就亮出了出生证照片，正如她所说：“上海是我父母的‘诺亚方舟’，是我的第一故乡。”^⑥可见年轻一代确实是把上海融进了自己的生命当中，而不是像老一辈那

^①Sigmund Tobias, *Strange Haven: A Jewish Childhood in Wartime Shanghai*,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p.8.

^{②③}W. Michael Blumenthal, *From Exile to Washington: A Memoir of Leadership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The Overlook Press, 2013, p.68, 69.

^④Helmut Spielmann, *Shanghai-Eine Jugend im Exil*, Graz: CLIO, 2015, SS.107-108.

^⑤Hannelore Heinemann Headley, *Blond China Doll: A Shanghai Interlude 1939-1953*, St. Catharines, Ont.: Triple H Publishing, 2004, p.180.

^⑥Sonja Mühlberger, *Geboren in Shanghai als Kind von Emigranten*, Berlin: Hentrich & Hentrich, 2006, S.58.

样把上海当作是人生旅途上的“候车厅”，自己只是上海的匆匆过客。

总体而言，年轻一代在父辈基础上都向现代迈进了一步。启蒙以后的犹太人走出隔都，开始接受外界的思想与文化，步入现代社会。因此到犹太难民逃出欧洲之前，欧洲犹太人已经被不同程度地同化或现代化，且中欧犹太人的同化程度要高于东欧犹太人。这就说明犹太难民来上海前在身份上已经具有一定的现代化基础，但是来自中欧与东欧的犹太人具有不同的身份起点。他们在欧洲的受难和上海的流亡进一步加速和加深了其身份的现代化，尤其是国际化、多元化、自由、开放和包容的上海社会为其适应未来的现代社会做好了过渡准备。经过上海这个熔炉的锻造和锤炼，年轻一代最终发展出了不同于老一代的新身份。

根据不同群体和个人原来的文化背景差异，年轻一代犹太难民在上海的文化熔炉中塑造出两种类型的人格。在本文讨论的青少年难民中，格列宾希科夫、赫普纳和布鲁门撒尔属于第一类型。他们都来自德国，是具有同化特征的犹太人。由于同化犹太人深受启蒙思想影响，思想上较为开明，因此他们来上海后很快便适应了社会，在广阔的社会课堂里学习和锻炼，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相对来说与传统的关系也就越来越疏离，属于完全现代化了的“现代人”。上海犹太难民年轻一代中的大多数都可以归属到这一类型下。

相比之下，来自东欧的传统犹太青少年（如托拜厄斯和鲁宾）在上海的现代化进程中则表现为一种“过渡型”人格。社会学家勒纳提出的“过

渡人”概念是指处于“传统者”与“现代人”之间的一种过渡型人格形象。^①由于他生活在双重文化背景下，一只脚留在传统之中，另一只脚已步入现代社会，因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退维谷、踟蹰不前。新旧交替造成的身份困扰使他们比同化犹太青少年更多了一份对传统的牵绊和漂泊异乡的孤独感。在度过了“转型”和“过渡”的苦涩后，他们终于也选定了现代化的道路，与第一类型的青少年殊途同归，但是传统文化打下的烙印不可磨灭。

“过渡人”的身份困惑是犹太传统在现代文化冲击下的产物，透露出战后犹太人面临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冲突。

无论如何，年轻一代树立起现代人格，对犹太文化及犹太人的现代化至关重要。犹太复国主义领袖赫茨尔认为犹太人不仅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而且要培养一种新犹太人。^②上海犹太难民中的青少年恰恰顺应了时代召唤，在上海的文化熔炉中完成了向现代人格的转变。

五、结语

在上海犹太难民流亡史中，上海总被比拟为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象征救赎与重生的避难所，也是通向美好与希望的中介。在上海犹太青少年难民自传里，上海被赋予了另一重象征意义——“锻造新身份的文化熔炉”，和“方舟”一样指涉新生需要依托的重要媒介。换言之，犹太难民在上海迎来了新生。这种“新生”不仅包含着继承和延续，更意味着改变和挑战。众所周知，二战浩劫为

^①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78页。

^②张倩红、艾仁贵：《犹太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3页。

犹太人带来了惨痛的教训和深刻的反思。大屠杀是现代社会的警钟，提醒他们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对自身做出相应的改变。上海犹太难民群体的变革力量主要在于年轻人，最重要的改变发生在年轻一代身上。我们在布鲁门撒尔、赫普纳和格列宾希科夫等为代表的青少年难民自传中看到，年轻一代犹太难民受上海国际化、多元化和自由化氛围的影响，与外界有了广泛接触。他们不愿受传统束缚，积极投入社会、关注现实并扩大视野，在上海发展出新的现代身份。而在托拜厄斯和鲁宾等青少年难民的自传里，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常常在他们身上产生矛盾，制造出身份的暧昧性。身份困惑贯

穿他们的成长历程，直至他们最终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身份转型。

总而言之，与欧洲社会和传统犹太社区重视法则、趋向保守的社会氛围相比，上海的新环境促使青少年难民突破原有局限，获得独立成长的机会。他们拥有了广泛的兴趣、树立了高远的志向，培养了社会和家庭责任感。许多青少年难民在上海举行了“成人仪式”（希伯来语：Bar-Mitzvah/Bat-Mitzvah），庄严地宣告自己已经成年，将承担应有的责任。这些历经磨难在上海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犹太人代表着犹太难民中的新生力量，肩负着开创美好未来的责任。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Identity in the Cultural Melting Pot of Shanghai: A Survey on the Autobiographies of Young Jewish Refugees

Gao Xiaoqian

Abstract: Most of the autobiographies of Jewish refugees in Shanghai published today are those of young Jewish refugees who were minors when they came to Shanghai, but are now the main body of Shanghai Jewish refugees all over the world. They have forged new identities in the “cultural melting pot” of Shanghai. Shanghai experience has influenced their worldviews, values and their courses of life in different aspect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memory of Shanghai in the autobiographies of young Jewish refugees, especially on the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and identity confus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growth, as well as the key role played by Shanghai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refugees’ modern identities.

组稿编辑：金方廷 责任编辑：陈锦文